

——|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

海上丝绸之路 与亚洲海域交流 (15世纪末—20世纪初)

[日] 松浦章 —— 著 孔 颖 —— 编译



国际知名海洋史学家 **松浦章** 教授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倾力之作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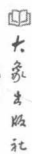
海上丝绸之路

与亚洲海域交流

(15世纪末—20世纪初)

[日]松浦章 著

孔颖 编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15世纪末—20世纪初 / (日)松浦章著;孔颖编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4

(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ISBN 978-7-5347-9569-5

I. ①海… II. ①松… ②孔…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5014号

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15世纪末—20世纪初)

HAISHANG SICHOU ZHI LU YU YAZHOU HAIYU JIAOLIU (15 SHIJI MO — 20 SHIJI CHU)

[日]松浦章 著

孔 颖 编译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徐清琪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杜晓燕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72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200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总 序

李雪涛

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科的观念,同时也打破了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中国史纳入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签订各种合约确定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仅仅是一个海外的存在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标准的尺度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摒弃。作为全球史之父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①,因为特别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45页。

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和改变。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 1922—1968)甚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①。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和空间的方式。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接触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米夏埃尔·盖耶(Michael Geyer, 1947—)和芝加哥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查理·布赖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②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空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目前我们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上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中文世界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些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就。全球史与中国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an Febvre, 1878—1956)意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他指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界、前沿、交叉处,正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③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他的自传中描述自己答辩的表现时写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

① 霍奇森:《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22—43页,此处见第43页。

② 盖耶、布赖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172—202页,此处见第186—197页。

③ Lucian Febvre, *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1953, p.30.

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端。”^①在历史学和汉学的交界处、边缘进行研究,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其实也是费正清之所以能另辟蹊径,成就美国中国学的原因所在。而我们编辑的“全球史与中国”系列,特别需要这种在知识和方法论方面交叉拓展的刺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提出“总体史”(l'histoire totale),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认为一切的人、事件只有放到历史的总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旦将中国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的话,中国研究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就会显现。拿中国近代留学史来讲,只有将中国的留学研究放在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全世界的留学运动中,才能够突显出其价值和意义。章清曾撰文探寻以容闳(Yung Wing, 1828—1912)、严复(1854—1921)和胡适(1891—1962)为代表的三代留学生的思想轨迹,认为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去美国和英国留学,从而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其后又纷纷踏上了一条异常艰难的回归之路。^②此外,留学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留学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学术的兴起,都曾起到过重要的意义。19世纪,美国就曾有过派出超过一万名留学生到德国洪堡大学留学的先例。^③美国不仅借鉴了德国大学的模式,而且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融合英式学院于一体,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办学模式。日本和俄国也都曾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到德国的著名大学留学,回国之后的这批留学生的成就,也大大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大学体制乃至社会的发展。

① 费正清(J. K. Fairbank)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② 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22—160页。

③ Cf. John S. Brubacher and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1636—1976*.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 175.

二

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纲领,亦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在四大步骤中,“输入学理”便是要引进异域(当时主要指西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目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经过改造的中国文明,亦即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按照胡适当时的理解,输入学理的重要性,在于在认识和接受一些普世理论的同时,反省、更新自己的文化,为的是重新确定中国文化作为主体身份的价值和位置。今天来看,“输入学理”的深层含义还在于认同和接受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胡适并不认为这种认同意味着为西方所同化,而是本土文化的“再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逐渐恢复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使之适应于世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胡适的纲领除起到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作用外,也为解决文化出路问题提供了中国的基本经验。

从根本上来讲,全球史所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史与中国”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的著作,这套丛书也包括世界与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之所以有这些专题,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相关的,年鉴学派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刘新成列出了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表达的互动模式的八种形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著《学问与人生》,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86—93页。

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① 上述全球史与中国的专题都可以归纳到刘新成所列的互动模式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 1949—2012)就认为世界史(全球史)所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②。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们坚持翻译著作和用汉语写作的论著并重的原则。梁启超(1873—1929)曾认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③当时依然流行的病灶心理,认为可以用译书来拯救中国。比梁任公早近3个世纪的徐光启(1562—1633)早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④的主张。徐光启的目的也是为了“超胜”。我们认为,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早成为世界的一分子,而从世界学术界汲取营养,与各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活动,永远也不会终结。在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今天,冷战时期诸如“谁取代谁,谁消灭谁”的用语,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翻译也成为我们的常规工作之一。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宏大叙事(宏观),将范围限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缺乏对实际发生事件的理论解释,进而将历史简单化、贫乏化。实际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介入可以很好地解决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新的学术方法的引入也会重视“过程—事件”的动态研究,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研究和全球视野的结合中来考察历史。我们收录在“全球史与中国”丛书中的研究专著,往往是运用上述方法论在不同专题性研究领

① 刘新成:《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见《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② 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③ [清]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898年,第52页。

④ [明]徐光启:《历书总目表》(1631),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

域的个案,力求给读者呈现出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此外,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事件史,历史学家必须在不同的时段中对错综复杂的事件作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分析。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往往是经济交流的附属品。因此,欧洲近代以来的贸易史,是裹挟着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等内容一并到了中国的。实际上,对全球史与中国各个研究方面的探讨,只有在对不同时空动态过程的具体考察中才能得到具体实现。同时基于全球史构建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也是双向的。尽管我们可能从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方面,并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但还没有到进行全程性、整体性研究的程度。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只有有待于后来学者的努力了。

三

尽管这套丛书名为“全球史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都只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的说明和阐发,很多著作是将中国的事件、学说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历史、思想等方面的普遍问题。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柯文(Paul Cohen, 1934—2007)的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1997)^①,实际上,想要处理的是有关在历史研究中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这套丛书我们既强调翔实的史料,研究内容的拓展,也重视新的方法和学理的引进。在以往研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档案资料的运用和整理出版,特别是对藏在海外的史料、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是非常重要的。而理论方面,在方法论和视角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的。总之,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式,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观念,并努力挖掘出新的史料,是这套丛书的特点。正因为此,这套丛书才可能会在读者那里产生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

①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014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要将研究院建成国际学者进行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在2011年新版学科目录中,首次将“历史学”下的“考古学”“中国史”,以及“世界史”并列为三个一级学科。也就是说在国内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因此,只有“全球史”才是欧美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国别史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从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编辑出版这样的一套丛书,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求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从而真正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

我们常常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意思是说学术是天下人所共享的财富,不应当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应当据为己有。这套丛书既有翻译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全球史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国内外在“全球史与中国”方面做出成就的学者,多多为我们提供优秀的研究成就,并不吝赐教。因为除了神,没有谁能够具有全能的视角。

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变通性的最终活力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和新的制度。但是当与外来者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由于受到关注而被迫彼此竞争时,同样也是这些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①在接触和交流不再成为障碍的今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真正能够促成中外学术在全球史研究领域的互动。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10页,引文略有变动。

序

中国的对外海上交流自古频繁,而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到近年才日渐受到关注。2014年9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广东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作了题为“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的主旨讲演,强调在海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会上共提交50余篇论文,鲜明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多样性。

虽然早已有人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到20世纪中叶至后半叶才起步,完全无法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相提并论。“海上丝绸之路”及海洋文化研究存在种种困难,首先是因为各种相关资料及文物不仅存在于中国,还散布在海外多国。哪怕仅限定于东亚海域,从语言而言,原先就有汉语、朝鲜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文献;当西方诸国来航东亚海域之后,各种西语文献激增,史料便更加汗牛充栋了。

但是如果将研究年代仅限定在亚洲海域的明清时期以及近代,则当时该海域各国均以“汉语”为通用之交流语言。例如,对漂流至中国的各国海难人员的最初接触,大多情况下是以汉语进行的,通过“笔与纸”的笔谈交流以确定其国籍和身份。由此可见,“汉语”作为语言接触、文化交流的最初手段,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在华各国人士之间的对话,有时也通过汉语笔谈进行。可以说汉语促进了多国间的交流。

本书即聚焦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亚洲海域的交流,以展示多样化的“海上丝绸

之路”。

本书得到“蒋振华先生中日研究奖学金”的资助。在此出版之际,谨向蒋振华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原为日文撰写,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孔颖副教授及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译成中文。本书的出版,也可作为对这些硕士研究生翻译工作的肯定。

目 录

绪 言 清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海域的交流	1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东亚海域的交流	15
第一节 清代帆船载中国砂糖运销日本及其影响	16
第二节 嘉靖十三年（1535 年）朝鲜使节在北京邂逅琉球使节	39
第三节 清代中国帆船救济漂流至日本之越南人之史实考略	59
第四节 清代广州与澳门的繁荣——江户时代日本人所看到的 广州与澳门	69
第二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东南亚海域的交流	83
第一节 成化二十二年（1487 年）苏门答剌国使节来航中国	84
第二节 清代前期对欧贸易中的广东与澳门买办	102
第三节 从新加坡报纸看中国海外移民状况	123
第四节 清代中国出口欧美的扇子	137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代东亚海域的船舶	151
第一节 鸦片战争之前来广州的欧美船	152

第二节	五口通商后上海、宁波的入港船舶变化	172
第三节	19世纪后期英国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之东亚海域航运	186
第四节	宁波商人虞洽卿创办的宁绍商轮公司	215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代中日间轮船航运	257
第一节	清末中日间轮船航运的定期航线	258
第二节	1882年三菱邮便轮船公司从日本运到上海的海产品	270
第三节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与中国	287
第四节	北清轮船公司在渤海的航运	306
第五节	20世纪初近海邮船会社在东亚海域的航运	324
结 论		353
史料汇编		359
参考书目		367
本书译者一览		375
后记		377

绪言
——清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海域的交流

明朝的“海禁”政策虽然在明末清初动荡年代有所松动,但至台湾郑氏归顺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为止,以清朝发布“迁界令”的形式得以延续。郑氏降清后,随着“展海令”的发布,中国沿海民众积极开展对外航海活动。当时中国帆船航行在日本、东南亚海域,十分活跃,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尤为活跃的是被称作清代四大帆船的沙船、鸟船、福船、广船。^①

航行于长江口崇明岛至北洋浅水海域以及运河水域的是沙船。这种推力强劲的帆船,把江南土布、茶叶等运送至北洋海域的山东半岛沿海、华北、东北沿海各港口,又将东北产的大豆、大豆油、豆粕等运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由此对江南的农业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鸟船主要在福建沿海制造。鸟船擅长远洋航行,航线延伸至日本及东南亚,尤其在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后期是连接中国与日本长崎的重要帆船。日本史料记载中留有不少关于鸟船的绘图。日本江户时代称中国帆船为“唐船”,其中大多是鸟船。^③

至于福船和广船,船如其名,乃福建或广东制造的大型远洋船只,但遗留的相关历史记载并不多。

本文主要阐述清朝中国帆船对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做出的贡献。

一、清代帆船与台湾海域的人口流动

台湾与大陆间航运关系的史料记载,见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月二十日闽浙总督郝玉麟的揭帖:“鹿耳门系全台(湾)出入咽喉重地,向来文官止巡检一员。”从中可知清朝初期虽然鹿耳门港是出入台湾的咽喉重地,也仅设巡检一员文官。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二“规制·海防”中记述曰:

① Matsuura Akira, Wang Zhenping translated,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Junks on East Asian Sea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Mainly Based on Sand Junks and Bird Junks,” *The Mariner's Mirror*, vol. 94 no. 2, May 2008, p. 150.

② 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運業史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2004 年。

③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朋友書店、2002 年。

台湾县:鹿耳门港(自厦至台大商船及台属小商船往诸、彰、淡水贸易,俱由此出入)、大港(台属小商船往凤山贸易由此出入)。

凤山县:打鼓港、东港、茄藤港(以上俱无大商船停泊。惟台属小商船往来贸易)。

诸罗县:笨港、蚊港、盐水港、猴树港(以上惟台属小商船往来贸易)。

彰化县:鹿子港(惟台属小商船往来贸易)。

淡水厅:海丰港、三林港(以上二港,地属彰邑。至小商船往来贸易,归淡防厅查验)、劳施港、蓬山港、后塍港、中港、竹塹港、南嵌港(以上俱无大商船停泊,惟台属小商船往来贸易)、淡水港(自厦至港大商船十只,名为社船,于此出入。台属小商船自三月东南风发,往来贸易至八月止)。^①

可见位于台南的鹿耳门港作为连接大陆福建省厦门的港口得以发展。随后台湾各地连接大陆的港口陆续开放,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彰化县鹿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北附近的淡水,道光六年(1826年)彰化县海丰港、宜兰乌石港。其间大陆与台湾的民间走私航运频繁,最具代表的为被称作“偷渡过台”的从大陆私渡到台湾的移民。有关记载见于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初十日的奏折:

本年八月十五日五更时候有澎仔船一只,遭风失去桅舵,飘至臣属青山仔后江湾地方,撞岸被风浪激碎。并无货物,止有男妇一百二十九名口……讯问口供,据偷渡民人叶豁、陈爱等供称,豁等系福建同安、诏安、龙溪各县人氏,因客头王彩即船户陈荣并算命的黄千、卜卦的黄喜招引豁等偷渡过台,其水脚银二两、三两不等。约于八月十二日,在福建厦门裂屿开船,众人陆续乘坐小船,在大担帽仔口白石头湖下等处出口上船,除船户陈荣、水手罗从、杨三、廖禄、何赐等五名,豁等男妇总共一百二十四名口,不幸于十三

① [清]蒋毓英等:《台湾府志三种》(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57—1458页。